



不完美的 《疯狂动物城2》 何以撩拨人心

龚金平

光影札

迪士尼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在中国市场掀起观影热潮,多项数据打破纪录,成为2025年最火爆的动画电影之一。在近期持续低迷的电影市场环境,这一成绩无疑令人振奋。

在票房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,不少观众也暗自疑惑:该片的制作水准固然精良,但剧情走向难逃俗套,部分桥段的逻辑衔接略显生硬、难以自洽,若干人物的塑造也稍显仓促潦草。

那么,《疯狂动物城2》为何能在相对冷清的档期里一枝独秀?更进一步说,大量成年观众在为影片喝彩时,他们感动的点在哪里?同时,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“一骑绝尘”,对中国动画片创作有哪些启示?

正邪交锋背后的 现实影射

《疯狂动物城2》中,朱迪与尼克成为警队新秀,两人联手阻止林雪桐家族对湿地市场的侵占,并揭发了该家族昔日欺世盗名的丑闻。这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常规故事,过程与结局未见太多的新意。而且,片中一些情节的逻辑自洽性有待商榷。例如,马市长在朱迪的言语刺激下,突然转变立场,从林雪桐家族的走狗变为“讨逆”急先锋,这一转折显得颇为突兀;牛局长此前一直将朱迪与尼克视为通缉要犯,却在关键时刻毫无过渡地摒弃前嫌,转而成为朱迪的助力,这种处理方式亦难以令人信服。

尤其在朱迪与尼克的探案途中,他们几乎毫无阻力地获得了众多角色的协助,如狸宝、荷苏斯、岩羊,以及前作中已建立情感联结的闪电、大先生等。这些角色在主角陷入困境时适时登场,如同接力般推动剧情前行,带有明显的“爽剧”叙事特质——优先追求情节推进的丝滑顺畅,却在部分人物行为逻辑的合理性、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上有所欠缺。

《疯狂动物城2》在剧作层面可能难称亮眼,但它必然在某个层面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,否则难以解释它能收获如此广泛的赞誉。

影片虽未直接针砭现实,却丝丝入扣地融入了普通人的职场境遇和感受。朱迪与尼克出身平凡,既无背景和资源,也无突出才华,偏偏身边强手环绕,他们时刻被无形的压力笼罩着。在他们看来,或许唯有凭借“疯狂内卷”,才可能占得一线先机。因此,牛局长分配任务时,两人虽并未被列入名单,却仍抢先一步主动赶赴现场展开调查。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背后,藏着的正是“打工人”的卑微与倔强,易引发观众的代入感。

影片还通过阶层叙事,揭露了社会运行中的潜规则。像林雪桐家族这样的权贵势力,不仅负责制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方案,还能公然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。更可怕的是,这种家族也能操纵舆论,在美化自我道德形象的同时,将个人私欲以社会福祉的名义包装成光鲜亮丽的民生项目。这样的刻画颇具现实隐喻性。

此外,影片中的爬行动物受制于公众的刻板印象与媒体的污名化宣传,被贴上了“邪恶”“阴险”的标签,遭到制度性的排斥与隔绝,被迫栖居于远离主流社会的湿地市场。这一设定直指“社会偏见与群体歧视”的普遍议题,多少是在为某些无法被看见、不会被听见的族群发声。这让影片的现实关照更

添一层深度。

因此,《疯狂动物城2》虽然讲述的是一群小人物、边缘人与“异类”的逆袭,但朱迪与尼克的英雄征程,并非对“美国梦”的乐观诠释,而是面对社会不公发出的冷笑与痛斥。当观众从影片中洞察了现实的痼疾,就能与朱迪、尼克等角色产生深度共情,并因此包容影片中那些逻辑的疏漏与人物刻画的粗糙。

成长中的 意识形态指向

朱迪与尼克堪称患难之交,两人曾并肩作战、书写传奇,本应是默契无间的完美搭档。然而,迥异的成长轨迹,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了观念分歧的种子。朱迪自幼便因出身与体型遭受欺凌与轻视,这份创伤让她格外渴望通过证明自我打破偏见。这是一种源于深层自卑的心理防御机制,最终催生出强烈的求胜心。反观尼克,他的精神创伤来自童年的颠沛流离,加之从小混迹街头,养成了一种“满不在乎”的散漫与松弛,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:唯有对事事保持疏离,才不至于在投入过多情感与期待后,再度陷入失望。

不同的成长经历,造就了朱迪与尼克迥异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。具体到办案过程中,朱迪渴望侦破每一起案件,让世界变得更美好;尼克则倾向于接受现实,认为世界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,难以凭一己之力扭转。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观念差异,导致两人之间渐生裂隙。

在经历了现实的冲击与观念碰撞后,朱迪与尼克终于完成了各自的反思与成长。尼克卸下了“无所谓”的伪装,坦言自己在乎的是朱迪本身,而非两人是否处处一致;朱迪也逐渐挣脱了“证明自我”的执念,明白他们是彼此不可或缺的支撑。最终,尼克点出了两人和解的核心:人与人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,可以有更多对话、更多理解,并实现团结互助。

由此看来,影片完成了对美国文化中坚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拨。朱迪起初渴望成为那个拯救世界的孤胆英雄,而牛局长、尼克与盖瑞等则提出了另一种视角:世界



并不会因单个人的力量或单一事件的成败而轻易改变;真正能推动世界向前的,或许是众人团结一致、坚持不懈的奋斗。

林雪桐家族中的小人物宝伯特的心路历程与朱迪存在互文关系,他在家族中被长期忽视,因而渴望以非凡成就赢得家人尊重。宝伯特承认自己不愿落后于人,更不甘于平庸,害怕在一个“优秀”的集体中因与众不同而被排斥。与之类似,朱迪为了被警队接纳,不得不努力与他人趋同,而非保持独特。这实际上警示了朱迪:一味追求个人成功,不仅会导致视野的狭隘与内心的偏执,还会因追随统一的标准而失去个性和内心尺度。

影片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主张:承认自己与他人的不同,鼓励社会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,实现彼此的理解、联结与接纳,最终构建一个既包容差异又和谐共处的共同体。

至此,我们得以破解影片的深层叙事密码: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显性主线之外,还暗藏着另一条脉络,即朱迪如何从信奉个人英雄主义,到逐渐认清并坚守自我个性,并对世界和他人变得平和宽容。这条暗线被精心编织于主线情节之中,主线的每一次起伏与转折,都在无声地触动并重塑着朱迪的认知与心境。这使得影片的价值内核变得厚重。

明线与暗线交织的 创作路径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动画电影的创作目标都较为单纯,专注于趣味性与伦理教化。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动画电影主要面向少年儿童受众定位,旨在充分释放其高度度假定性的艺术特质,满足观众对奇幻夸张世界的想象,并为此有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。



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海报

剧光灯

改编自麦家小说的音乐剧《风声》不久前于上海西岸大剧院上演,凭借颇具冲击力的舞台视觉、宏大开阔的音乐格局与豪华强劲的阵容班底,备受沪上文艺界瞩目。此前,基于麦家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积累了广泛受众基础,如今,音乐剧的创作自然也引发行业关注与市场期待。与此同时,一个核心疑问也随之产生:以文学叙事的情节铺陈与悬念营造见长的《风声》,如何转化为以音乐和肢体表演为核心元素的舞台表达?文学中的情感肌理与叙事技巧如何转换为生动的舞台叙事线索,进而建构起舞台化的情感路径与事件现实?

从文学的纪实感 到舞台的戏剧化提纯

麦家的谍战小说中悬疑氛围层层递进,惊险事件环环相扣,发现过程抽丝剥茧,情节反转出人意料,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充满戏剧张力的谍战世界。故事中人物被赋予传奇色彩,智勇双全并具备超凡的洞察力与行动力。同时,他们又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与人性底色,在宏大叙事中注入了强烈的人性化的悲剧意识。传奇与悲剧交织,加之叙事刻意营造的纪实感,虚实相生间加深了读者和观众的心理感受。

从文学、影像转向音乐剧,需要在保留原著精神的基础上,找到属于舞台的语汇逻辑,将文字创造的惊涛骇浪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戏剧节奏,将文字的“悬疑”转化为剧场的“沉浸”。首先,音乐剧《风声》在故事内核上向原著回归,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果断放弃原小说细腻复杂的情节,而对小说核心元素进行大胆“提纯”与“转化”。作品充分发挥了音乐剧在封闭空间、心理博弈、信仰牺牲三大主题上的表达优势:设计一个象征性的舞台空间、勾勒核心的人物情谊,创造强烈的视听节奏与符号,完成了对原著故事的高度提纯和戏剧化浓缩。同时,它舍弃了原著小说精妙的“罗生门”式多视角叙事,以及电视剧版铺陈的庞杂前史与双线情节,采用音乐剧经典和紧凑的线性叙事,将焦点凝聚于“裘庄捉鬼”这一核心密闭情境,使得舞台之上的戏剧冲突如同被加压一般,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和叙事的集中度。

在关键人物的命运表现与音乐艺术功能性上,安排了大段的独唱与二重唱,交代了剧中人物顾小梦与李宁玉两人从猜忌试探到深刻理解和,直至以性命相托的情感历程和心理感应。聚焦并强化双女主核心关系叙事,烘托出女性情谊与人物的悲剧性,人物刻画比文学原著更为浓烈和集中。音乐剧需要简化故事和人物的发展线索,因此,大幅简化了吴志国、白小年、金生火等其他人物的背景故事与个人动机表达,这些人物在剧中更接近于功能性的角色,服务于主线冲突的推进。

从具象场景 到意象空间的舞美建构

音乐剧《风声》在舞台视觉呈现上达到了国内原创音乐剧的一流水准。主创团队摒弃了写实主义路径,转而运用极其现代的多媒体投影与灯光语言,成功营造出一个既封闭压抑又充满诗意的审美空间。“裘庄”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场所,而成为一个象征命运囚笼与人性试炼场的核心意象与超现实场景。

它的点睛之处在于将故事“封闭空间中的心理博弈”这一核心设定进行了视觉化与实体化处理,使整个舞台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“密室”。其倾斜式主舞台被设计成角度倾斜的地板,不仅通过不稳定的地面直观传递出角色步履维艰的状态,暗示局势的倾斜与内心的失衡,更在视觉上构建出充满动态张力的画面,强化了空间叙事的不安定感。

舞台技术与艺术的有效结合使用,使得墙体与隔断可自动移动与重组,实现了舞厅、审讯室、卧室等多重场景的瞬间无缝切换,不仅保证了戏剧节奏的流畅,更塑造出一种迷宫般的空间体验,贴合原著“密室捉鬼”的核心

故事提纯与音乐转化: 《风声》的音乐剧转译之道

设定。这使观众切身感受到角色被困的绝望与“老鬼”近在咫尺却难以捕捉的悬疑氛围。移动墙体所创造的三折叠屏幕——天幕、地幕、底幕构成分割多重空间,透视线条勾勒出3D效果,多媒体投影与实体布景结合,表现电报密码、风暴来临等场景更进一步将“监视与被监视”的主题具象化,视觉化地呈现出每个人既是猎手也是猎物的复杂处境。

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剧中“鸿门宴”一场,由众多红色花卉扇阵构成的视觉主体,配合灯光与演员群舞的调度,将表面的歌舞升平与内里的刀光剑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写意、象征的手法,赋予舞台高级的电影质感和丰富的解读空间,充分展示了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。从视觉层面而言,《风声》无疑是一场盛宴,将抽象的内核转化为可观可感的舞台力量,让观众获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沉浸。

音乐叙事的 本体性表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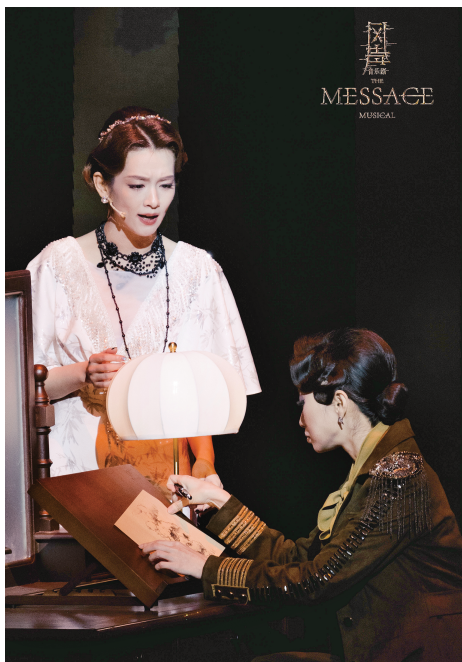
音乐剧《风声》以声景叙事,用歌舞咏志。大量运用不协和和弦、急促的弦乐断奏、持续的低音嗡鸣以及模拟电报码的打击乐,形成了独特的戏剧音乐风格。在现场乐队的精准演绎下,在听觉层面持续构筑出一个危机四伏、令人心神不宁的声场幻境。而剧中那些倾泻而出的咏叹与宣叙,不仅是旋律,更是灵魂的告白——李宁玉与顾小梦的《知己》,超越姐妹情谊,成为一曲中精神同盟的宣誓;一曲《万箭穿心》,则以破碎撕裂的音乐线条,将理性崩塌的瞬间具象为听觉的悲剧情调。

音乐剧《风声》用音乐本体性表达,串联起在至暗时刻人何以能为追求未来的光明,赌上已知的一切、全部人生的生命之问。被囚禁的身体、理想与信仰、具象的人物故事在抽象的一波波声浪中,涌入观众的听觉之中。声音响起,生命在场,台上故事落幕,台下山河已新。风声不息,信仰便永如壮歌,在新的时代,再次被唱响。

《风声》从文学文本成功转化为音乐剧文本,但仍有需要提升的地方。如音乐叙事与戏剧结构之间存在专业连接上的缝隙,反派人物肥原龙川一曲曲念亡妻的《魂归兮》,旋律动人,但其出现略显突兀。由于前期缺乏足够的情节铺垫与心理刻画,这段重要的独唱非但未能令人物变得丰满复杂,反而因动机的仓促而削弱了其本该具有的悲剧张力,与紧凑的“捉鬼”主线产生了疏离感。其次,部分充满戏剧张力的对峙唱段,歌词编排得过于密集造成信息过载,演员在较高的音域和激烈的情绪中,不得不以极快的语速演唱,观众既要紧跟字幕,又要欣赏舞台表演,视觉与听觉被迫“双线作战”,疲于奔命,弱化了接受度。叙事节奏被打乱,自然情感共鸣和音乐审美便受到一定的损失。音乐剧的旋律和节奏,以及优美的歌曲,都是戏剧高级功能

的有机组成部分,既是推动音乐剧剧情发展的核心脉络,也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延展与情节推进之道。文学戏剧化与戏剧音乐化,这种双向奔赴会成为艺术创作的常态,而戏剧音乐化并非一味让戏剧为音乐“让路”,而是需要两者有机组合。这也是音乐剧《风声》给我们带来的思考。

作者单位: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(含音乐剧中心)



音乐剧《风声》剧照

特约刊登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